

歷史的誤區

——党内若干重大冤案错案纪实

- 井冈冤魂
- 富田“反革命暴动”之谜
- 反“罗明路线”真相揭秘
- 血洒白雀园
- 令人心碎的枪声
- 微山湖畔的阴影
- 滴血的野百合花
- 他们在哪里失足
- 共和国第一冤案

历史的误区

——党内若干重大冤案错案纪实

汪 剑 李 全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93 年 · 武汉

鄂新登字 01 号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及文献】

《革命史资料》，文史资料出版社；
《党史信息》，文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研究》，文史资料出版社；
《党史通讯》，文史资料出版社；
《人物》，文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红色的起点》，叶永烈著；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叶永烈著；
《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
《湘江之战》，黎汝清著；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索尔兹伯里著；
《中共党史文摘年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党史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五十年》，人民出版社。

历史的误区

——党内若干重大冤案错误纪实 汪 剑 李 全

出 版 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邮政编码：430022

发行科电话：537093

责任编辑：邓宁辛

印 刷 者：湖北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18

发 行 者：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张：6.5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 000 册

字数：180 千字

ISBN 7—216—01072—8/D·270

定价：3.60 元

本版图书如印制质量不合格，可以由印刷厂调换

编者的话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是一个光辉的历程,她的业绩是伟大的业绩。

在这样一个历程上自然伴随着坎坷与曲折,也曾飘过那么几片黑云,也曾经有过不可避免或可以避免的一些错误与失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在于她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包括拨开罩在自己眼前的云翳,战胜自己的错误,拨乱反正。

这本书所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经受的若干挫折与“左”的错误带来的危害,以及党和她的各级组织是如何战胜这些挫折、错误与危害的。党内的错误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这丝毫无损于党的光辉,党从挫折之中寻找到了反面的教训,经受了考验与锻炼。

本书的资料均引自近年公开出版的党史资料及文献、回忆录,基本上都是有结论的事件。从这些资料与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党内生活民主化是何等重要!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又是何等重要!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了殷鉴。回首往事的意义正在于帮助我们走出“历史的误区”。

历史正在向前进。正如本书作者在书中所说:“历史的过错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前程永远光明。

历史的误区

——党内若干重大冤案错案纪实

井冈冤魂——袁文才、王佐被杀案 (1)

两个同年出生的老庚，两个一度威震井冈的土匪司令，两个红军初建时期的指挥官，两个共产党员。同一个拂晓，他们一个死在战友的枪下，一个被逼淹死于河中。毛泽东闻讯大摇其头，彭德怀日后横遭攻击。这是为什么？

富田“反革命暴动”之谜 (15)

国民党军队已大兵压境，彭德怀收到伪造的毛泽东“亲笔信”，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竟张贴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不到四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出了十分之一的“AB团”分子；1000多人的鲜血仅换来肃反委员会主任一条生命……

反“罗明路线”之真相 (26)

一个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一个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罗明，竟遭大张挞伐的批判；路线错误。邓小平为此罹难，肖劲光被判徒刑。几十年后，李维汉的一句话道出了个中奥妙。

血洒白雀园——鄂豫皖“肃反”纪实 (37)

他们先后走出黄埔军校的大门，又先后跨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中，没有死于敌人的枪下，却先后死于自己人挖掘的墓坑里。一代名将，横遭不幸。这正是：伤心志士黄泉去，唯有悲歌留后人。

令人心碎的枪声——错杀高敬亭案 (46)

一声清脆而低沉的枪声，结束了他年仅31岁的生命，宣判者是他敬爱的领导，行刑者是跟随他多年的部下。想当年，蒋介石曾悬赏重金要他的人头而不可得，看身后，毛泽东曾发出困惑的疑问：“……不杀头可不可以？”

微山湖畔的阴影——湖西“肃托”事件…………… (55)

一个杜撰的神话,一批无辜遭杀的干部,一场令人战栗的噩梦。这一切都发生在微山湖畔——那个铁道游击队出没的地方……

滴血的野百合花——“王实味案”…………… (63)

他欣赏延安漫山遍野的野百合花,却万万没想到这是他生命中的不祥之花。主席看了他的文章,说“斗争有了目标”,将军看了他的文章,挥臂喝斥。一时间,座上客成了阶下囚,鲜血滴落黄土地,该杀?还是不该杀?

他们在哪里失足?——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 (76)

阳光灿烂的革命圣地,一群投身革命的青年,一时变成了失足者,这是为什么?新年元旦,他们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则脱帽向他们鞠躬,这是为什么?当年的“失足者”,却是坚定的革命者。那么,谁又是真正的“失足者”呢?

共和国第一冤案——子虚乌有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 (87)

一场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空袭,导致了他们命运的转折。从此,两个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共产党员,蹲进了共产党的大牢。于是,便有了这个“共和国第一冤案”……

井冈冤魂

——袁文才、王佐被杀案

永新：拂晓前的枪声

临近拂晓，罗霄山脉中段的永新县城正沉睡在一片寂静之中。

昏暗的街灯，拉长了一个人的身影，那是一位卖豆浆油条的老表挑着担子在踽踽独行。一年三百六十日，他起早贪黑地劳作以赚取几个可怜的铜板，来维持一家八口人的艰难生计。

老表拐上店铺林立的正街，一股寒风扑面而来，他打了个冷噤，两只水桶摇晃起来。他立住脚，大喘了几口气，还没有缓过神来，蓦地，他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惊呆了。

老表看到了一支穿灰布服装的正规红军！

这座小县城的老表们已经有一阵日子没见过正规红军了，据说彭德怀的红五军正集结于吉安附近，有迹象表明要攻打吉安。驻防在永新的主要是地方武装。近两日，老表们看到县城里武装人员云集，那不过是茶陵、莲花的农民赤卫队和自卫军们，那欢天喜地的样子不像是打仗，而是来欢度什么节日似的。

街心行走着的红军约有一百余人，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紧张的神情，枪刺闪着寒光。

莫非这儿又要打仗？老表暗自嘀咕。老天爷，千万别打，刚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呢！他想上前问问，看到红军们那冷峻的表情，又不敢问，况且，红军是纪律严明的队伍，问也白搭。

就在老表与红军擦肩而过时，他忽然纳闷起来：这些红军为什么不在白天进城呢？看他们的样子，似乎已经赶了不少路了，他们从哪里来？

老表当然不知道，这支红军这个时候进入城中，是为完成一个特殊任务而来。

这支部队是红五军第四纵队，他们是从九十多里开外的红五军军部赶来的。出发前，每个人的手臂上都扎上了一根白带子，而且被告知永新城已换了新的口令，如果遇上没扎白带子或者对不上新口令的武装人员，可以开枪。

这支部队里还有一位地方干部，他就是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

尹家巷 22 号的一间厢房内，一张老式雕花大卧床上，红四军前参谋长袁文才正沉沉酣睡。在他 32 年动荡而惊险的生涯中，很少有睡得这样沉的夜晚，何况他昨天晚上又多喝

了几杯酒。

大约在10天前，袁文才与他的老搭档、红五军第五纵队司令王佐率领部队从湖南茶陵赶回井冈山下的宁冈县城。这次他们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打垮了地主武装茶陵县挨户团，并且活捉了团总罗克绍。部队刚到驻地安顿下来，宁冈县委派人送来了特委的一封信。

袁文才接过信，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袁、王：

为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事，拟将你部改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袁文才任司令，王佐任副司令。着你部于本日22日赶赴永新县城集合编队。此令。

特委

王佐凑过来，问道：“都写些什么啊？”

“老庚，这回可要啃大骨头啦！”袁文才笑着说。

“什么大骨头？你别打哑谜了。”王佐嗔道。

“打吉安！”袁文才回答说。接着把特委的命令向王佐复述了一遍。

王佐兴奋地搓着手：“不错，这可真是根大骨头！”

“老庚啊，好好干吧！”

军令如山。2月22日，袁、王部队除留少数人在宁冈外，大部于当天抵达永新县城。特委事先已经安排好了袁、王二人和部队的住宿地点。袁文才住尹家巷，王佐住尹家祠内，部队分住几个店铺，与袁、王住地有一段距离。

当天下午召开了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袁文才一进场，就感到气氛有些异样，他从特委书记朱昌偕和几个特委委员的眼神里看到了嫉恨。会场中央，端坐着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一见袁、王二人走进来，便冷冷地盯了他们一眼。顿时，袁文才感到一股凉气顺着脊梁骨直往上窜。

但是，他很坦然，因为他的心是坦荡的。

而且，他对这种眼光并不感到陌生。

会议由特委书记主持。在报告了一下各县到会人数后，他清了清嗓子，用高出八度的声调宣布了会议的议题：

“今天，主要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对袁文才、王佐所犯错误进行严肃批评！”

袁文才只觉得一股热血涌上脑门，差点蹦了起来。妈的！原来改编部队是假，要整老子啊！老子到底有什么错，特委几个人老揪住不放？

终于，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使自己镇定了下来。他甚至有点安然了：看他们到底说些什么？他用眼睛的余光扫了坐在旁边的老伙计王佐一眼，只见这位仁兄的腮帮在不停地抽动，看来也是气满胸膈了。

他伸出右手，暗自捏了王佐一把，他怕他冲动起来，这家伙的性情可暴烈呢！

王佐没有动。袁文才松了一口气。

巡视员立起身来，从容不迫地讲话。袁文才的脑子里乱糟糟的，没有听清巡视员的开场白讲了些什么，可在列举他和王佐的“罪状”时，却那么真切无误地传入他的耳鼓：

“袁文才、王佐目无组织，受编不受调，土匪习气！”

“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政权！”

“勾结茶陵挨户团罗克绍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

莫须有！纯粹是莫须有的罪名。天知道他们是怎样想出那些鬼名堂来的。袁文才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请问巡视员同志，你给我列举这么多的罪状，有没有证据？我和王佐的田都分出去了，怎么是反对分田？我自己曾是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又如何反对自己的政权？我和王佐把罗克绍从茶陵抓来，算是扰害赤色政权吗？”袁文才一口气发出一连串责问。由于愤怒，他的脸涨得通红。

巡视员彭清泉被这一阵连珠炮击懵了，他还没见过敢如此顶撞他的下级，不由得怒发冲冠：“放肆！袁文才，这是你对待组织的态度吗？”

“我只要求你解释清楚！”

“对！你要解释清楚！”王佐也站起身来。

一场唇舌大战顿时爆发。你一言我一语，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会场里乱成一片。

最后，巡视员被弄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恼怒之下，他掏出白朗宁手枪，使劲往桌子一拍，吼道：“袁文才！你到底有没有错？”

王佐见状大怒，也把手枪从腰间掏出来往桌上一拍：“你想干什么？”

沉默。会场里的气氛十分紧张。

特委成员们愣了一会，连忙走上前来打圆场。眼见得会议实在难以开下去了，特委书记朱昌偕宣布休会。

袁文才和王佐走出会场，仍意气难平。

尽管出现了这种令人不快的事情，但袁、王及其部队仍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应该说，特委的安排是周到的，他们备下了丰盛的酒席，让战士们尽情地饱餐了一顿。入夜，又请来采茶班子演了一台戏。

第二天晚上，特委书记朱昌偕备好酒菜，来到袁文才的房间。

特委书记的神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热情、诚恳。他斟满两杯酒，然后举起自己手中的酒杯，对袁文才说：“来来来，老袁，我敬你一杯！”

袁文才的情绪显然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他毫无表情，一把抓过酒杯，一仰脖子咽下了那杯酒。

“好！”特委书记也喝干了杯中酒，又分别斟满两杯。“老袁，昨天的事情你也不要往心里去，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开辟井冈山的有功之臣嘛！”

袁文才听到这句话，不由得心头一热。

他并不是喜欢听奉承话的人。但是，他渴望理解，需要同志之间的温情、体谅。对他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

酒酣耳热，欢情甚洽，袁文才满肚子的委屈一点一点地散去。

特委书记与红四军前参谋长的对饮直到10点多钟方散。

送走朱昌偕，袁文才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便睡下了。

他睡得很沉。

静寂的夜里，死神脚步已经渐渐走近……

与老表相遇的那支红军已悄然临近袁文才居住的尹家巷。

特委书记朱昌偕的胸中交织着兴奋和紧张的情绪。他手中那支盒子炮也不时轻微地颤动。

多么奇妙！几个小时前还与他在一起喝酒的那个人。马上就要死在他的枪下了，真是不可思议。一刹那，他感到了人生的无常。

“但是”，他告诫自己，“这是革命，我代表的是革命，就是因此而献身，我也在所不惜！”

他想着，脚下的步子加快了。

部队很快来到了22号门外，带队的军官一挥手下，士兵们四散分开，进入了临战状态。

几个士兵像猫一样灵敏轻捷地攀上墙头，跳进小院，打开了大门。

朱昌偕冲在头里，一抬脚踹开了袁文才的房门！

袁文才被突如其来的巨响惊醒，本能地把手伸到枕头下去摸枪。

晚了！朱昌偕手中的盒子炮爆出一团团火光，20发子弹象雨点一般洒到了袁文才的身上。

至死，袁文才也没看清行刑者的模样。

县城的另一片街区。

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带领着另一队红军正急步赶往王佐居住的尹家祠。

眼见离目的地不远，忽然，传来一阵爆豆般的枪声。

“那边动手了，快！”彭文祥喊道，部队疾跑起来。

待他们涌进王佐居住的房间，发现已是人去房空。

彭文祥一探手，摸了摸王佐床上的被子，感觉余温尚在，马上命令道：“他们还没跑多远，追！”

原来，枪声一起，王佐赶忙跃出了被子，匆匆穿好衣服，带着警卫员逃了出去。

他们飞奔着，由东门出了城，很快到了永新有名的“东关潭”。

名为“东关潭”，其实不是“潭”，只是绕城而过的禾水的一段较深的河床。河面上有一座木船和木板搭成的浮桥。

王佐一行跑上了浮桥。

“糟了！”跑在最前面的刁飞林惊叫道。

“怎么了？”王佐连忙问道。

“桥给拆断了。”

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开会；追杀；断桥。一阵愤怒袭来，王佐的牙关咬紧了。

时间已不允许他多想，身后已响起枪声，夹杂着“站住”、“别让他跑了”的叫喊声。

王佐是个“旱鸭子”，在这危急关头，他顾不了那么多了，一纵身跳入了冰冷的河水。紧接着，他的警卫员们也跳了下去。

河中溅起一阵高高的浪花，仿佛在拥抱这些大山的儿子。

“他妈的！”匆匆赶到断桥边的彭文祥气得脸色铁青。

他们朝河中胡乱地放了一阵枪后，悻悻地走了。

拉拉杂杂的枪声一直响到天明。袁部几个主要骨干都先后被抓住枪杀了，只逃出了小部分人。王部大部分人逃走了。一批下级军官被逮捕，以后下落不明。整个袭击过程中，袁、王部被淹死、打死者共40多人。没有跑出去的战士们被关了3天，愿回家的给了路费，愿留下的部分编入了红五军，部分编入了宁冈县游击队。

一支极富战斗力的红军部队就这样在一夜之间瓦解了！

他们不是在战场上被敌人而是由自己营垒中也许昨天还在一起握手搂肩的战友们解除了武装。

天已大亮。惶恐不安的永新老百姓被告知：“袁、王反水（叛变），被红军解决了。”

这是1930年2月24日，农历正月二十六日，离开春节——那个中国人喜庆热闹的节日不到一个月。

（几天后，沿河搜索的红军战士们在下游发现了王佐的尸体。）

绿林出身的“特别党员”

袁文才和王佐生前均在共产党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担任军政要职，死的时候年纪也很轻（两人同为32岁）。这两个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而又正当人生盛年的人，究竟犯下了什么弥天大罪，以至于死于非命呢？

据当时湘赣边界某些军政领导人的意见和地方党委的文件，袁、王二人应是罪无可恕，罪不容诛的了，择其要点大致是：第一，袁、王二人被认定为是“土匪”首领。边界特委前书记邓乾元、红五军政治委员滕代远的报告，赣西南特委和红五军前委、军委的一些报告，均以十分嫌恶的口气指斥袁、王为“土匪头子”。第二，袁、王二人有两大罪状。1930年4月9日，也就是袁、王被杀40余天之后，赣南特委发布的《通告——列宁一号》中指责袁、王二人“一是，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二是，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红色政权内部出了这样的“乱臣贼子”，难道不应坚决地予以剪除吗？

战事频仍，戎马倥偬。人们仿佛没有心绪抑或没有精力去拨弄一下笼罩在袁、王事件上的层层疑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事件亦渐渐为人所淡忘，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个名字退出了革命队伍中的话题。只有当时任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在听取了红五军第五纵队政委何长工和湘赣边界特委秘书长陈正人的汇报之后，摇了摇头他那披满长发充满智慧的头，表达了他的极大遗憾：“杀错了人啊！”在场的人从他那低缓的声调中品咂出了沉重的滋味。

毛的表态不是随便作出的，因为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人，作为这一段峥嵘岁月的见证人，他是太了解袁、王二人了。

袁文才，又名选三。江西宁冈县茅坪马源坑村人。他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父亲是个老实勤劳的农民。因为祖上几辈都没出过读书人，父亲发誓要袁文才读书，这样，他一直由小学念到中学，终于因家境窘迫而失学回家，与周围普通人一样过起了娶妻生子的日子。但袁文才毕竟又与普通人不一样，他识文断字，见过几许世面，血管中早已注入了不安份的血液，他不能忍受贫穷困苦的生活，更不能忍受土豪劣绅的欺凌侮辱。于是，他串通起村里的乡亲们起来抗交租捐，并当众揭穿了村中一个大土豪施贿竞选省参议员的伎俩，从此与其结下不解仇怨。不久，土豪们勾结北洋军阀，派来一个连的士兵前来捉拿袁文才，袁于事先听到风声，潜逃他乡。等风声过后回到村中，却面临一幅惨景：他那本来就近乎一无所有的家，已被洗劫一空，妻子被人强占，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而他那贫穷了一生的善良老母，也被土豪们射杀于乱枪之下。愤怒和悲哀差点摧垮袁文才的理智。他长叹几声，又长啸几声，最后告别乡亲，一头钻进村后那片茂密的山林中。

近1年之后，井冈山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的绿林马刀队里，多了一位文弱如柳的二头领，他就是袁文才。

与袁文才相比，王佐的经历具有更多的传奇色彩，他是江西安福县金田人，比袁文才先出生5个月。据说他母亲在生他时，恰逢阵雨过后，夕阳西下，云霞骤然生辉，映红了半个天空。父母请了一位老先生给儿子起名，那老者看了天象，认为是个好兆头，便沿着他哥哥云龙的名字排下，叫云辉。王佐3岁丧父，剩下寡母一人，艰难地抚养着六个孩子，根本无法供养孩子读书，王佐也体谅母亲的难处，小小年纪便帮着娘挑起家庭重担。12岁时，王佐离开家庭给人当裁缝学徒，两年后学成，开始了游乡串户的裁缝生活。有一次，他在给一家豪富做衣服时，因豪富克扣工钱，双方发生冲突，结果引来豪富召了官兵来捉人，王佐闻讯避进茫茫罗霄山，后经人指点，投奔了井冈山一带的绿林好汉朱聋子，“杀富济贫，替天行道”。那时，王佐才15岁。1924年夏天，王佐用60块银元买了一支九响毛瑟枪，回老家邀集旧时相交的十几名青年，独自组织起绿林队伍，自称营长，四处“吊羊”。这时，恰好遂川税警数人前来催粮收款。他觉得这是个夺枪的好时机，便与哥哥王云龙商量，大摆筵席，灌醉税警，将他们全部缴械。从此，王佐威名大震，势力不断扩大。

王佐与袁文才分属两支绿林队伍，两人原本并不相识，后来结拜为“老庚”（同年所生的结拜兄弟），在王佐看来，纯属天意。学做裁缝时，他结识了一个算命先生，两人很是投缘，那位先生曾给王佐观星象，并断言罗霄山上空的星位中，有两颗亮星，为一文一武，武的即是王佐，文的暂不知名，日后必能在井冈一带共同为王，王佐深信不疑，他拉起队伍后，得知绿林马刀队里有一位博学多才，满怀韬略的袁师爷，遂认定袁文才就是那颗文曲星。1926年，王佐接受“招安”，下山就任永新、遂川边陲保安团“团总”。不久，其部下李某欲夺团防大权，纠集几十个人深夜包围王佐住宅，王佐钻洞逃出，直奔茅坪找到仰慕已久的袁文才。相见之下，两人情投意合，遂歃血为盟，结为兄弟。

井冈山一带“自来为土匪、散军的窟穴之所”，大大小小的司令不胜枚举，袁、王能从一个普通成员，成为自拉杆子，独占一方的首领，是和许多对手进行了多次生死搏斗才取得的，殊属不易。他们两人不同于一般绿林的地方，是除了经济目的以外，还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目的。两人出身贫寒，又都有过痛苦的生活经历，像《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一样被逼上梁山，各自揣着复仇和寻找出路的动机，因而他们“劫富济贫”的旗帜特别鲜明，专和官府豪

绅做对头。他们具有正义感，做事情讲几分“公道”，加上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政策，所以获得宁冈、井冈山群众的拥护，成了那一带贫苦农民的保护神。

1925年7月，宁冈县新城塘南的青年学生龙超清，受中国共产党派遣，由南昌回到宁冈领导当地的革命斗争。他说服袁文才率部下山受宁冈县政府招安，进驻县城。第二年，北伐军由鄂入赣向北洋军发起猛攻，兵锋逼近宁冈。这时，袁文才思想上已逐渐接受革命，遂率其部——宁冈县保卫团举行武装起义，包围县公署和清乡局，缴获了该局的枪支，并把北洋军阀委派的宁冈县长驱逐出境，使共产党掌握了全县，保卫团改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成为听命于共产党的农民武装，袁出任了总指挥。此后，连续几任反动县长来宁冈任职，没有一个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在袁文才的影响下，王佐部也转到支持革命的一边。王佑下令停止向五井区域的农民征粮收捐，并在遂川县农民协会派来的中共党员帮助下，将自己的队伍改编为农民自卫军。

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会同王佐干了一件足以彪炳两人历史的大事，可以说正由于他们这次的义举，才有了以后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那是1927年6月，永新的土豪劣绅买通几股土匪偷袭县城，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猝不及防，枪支尽被缴去，中共永新县委、县农民协会负责人贺敏学、王怀等人在内的80多名党员被投入大牢。这些落难的党员想到了已成为共产党员的袁文才，便利用老表们前来探监的机会传出密信，要袁文才率部攻城营救。袁接信后连夜赶往茨坪，动员王佐参战，又派人前去联系安福王新亚的农民自卫军。7月27日，袁、王两部300余人在永新县城南门发动猛攻，终于攻克城池，旋即打开监狱，救出了正遭受牢狱之灾的共产党员们，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主席，王佐、袁文才、王新亚任副主席。三支农军在城中驻扎几日后，为避敌锋芒，保存力量，撤往茅坪。袁、王部先后三次击退敌军对茅坪的进犯，并各自保存了60多条枪。

不久，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暴动，失败后，毛率残部800余人退往井冈山。此前，毛泽东对于部队的下一步去向是假道湘赣边界前往湘南，还是在有人举荐过的井冈山落下脚来尚未定准。军队至莲花县境时，身携中共江西省委指示信的宋任穷赶来传达了省委书记的口头指示，即要部队向宁冈转移，这个指示加上毛泽东对井冈山形势的了解，使毛确定了屯兵宁冈休养生息的决策。毛当然知道山上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亦清楚袁、王占据井冈已久，有很大的势力，战斗力不弱，在民众中还颇有威望。历来的绿林豪强是格外戒备外来力量的。在没有征得袁、王同意之前，尚不能贸然前往。因此，毛将部队停驻在永新三湾，一方面对部队进行整编，一方面尽快与袁文才联系。当天下午，毛泽东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茅坪。

袁文才接信后，立即召集农民自卫军的大小头领共商对策。曾在广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的司书陈嘉平，听到信的落款是毛泽东，兴奋异常地告诉众人：毛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前不久的秋收暴动即是他领导的。袁文才听后惊喜交集，略加思考后当机立断，决定迎接毛部上山。当时，也有的头领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劝袁谨慎行事，以免养虎遗患，招来祸殃。袁文才断然驳斥说：人家不会这样做。为慎重起见，他派代表去三湾同毛泽东接头。

两天之后,毛部移驻宁冈古城。

东源大仓村,毛泽东与袁文才第一次会面,作为见面礼,毛送给袁部 100 支步枪,袁文才与众头领在大喜过望之下,当场赠银洋 1000 块以为回报,并答应包下工农革命军的粮饷供应,帮助在茅坪设立后方机关。次日,毛部开到茅坪。

茨坪方面,王佐对毛部到来颇感惶惑。在他的记忆中,似乎还没有哪支正规军队如此深入地进到井冈山腹地。这时,“老庚”袁文才及时地报来信息,告以毛部详情,王佐才消除疑虑。毛、袁会面半个月后,工农革命军欲过井冈山,王即选派亲信到荆竹山迎接,并亲自带队伍到双马石哨口欢迎。当时,毛泽东正派人协助袁文才在步云山练兵,而袁的行为举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王佐很是钦羡,经与部下商议后,决定请毛泽东派干部来。1928 年 1 月,何长工来到王部任党代表。

昔日的绿林武装经过整饬,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部队。2 月,袁、王部分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一团为毛泽东部),团长袁文才,党代表何长工,王佐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5 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残部来到井冈山,两军会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袁、王部编为该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两人仍分任正副团长。

在井冈山斗争的整个历史时期,袁文才与王佐立下了不少战功。新城战斗,在西门歼敌,最后将敌军一网打尽。龙源口战斗,袁文才率部于关键时刻奇袭敌军前线指挥部,使敌失去指挥中心而全线崩溃。在五斗江、黄洋界、凹头陇和睦村等战斗时,亦表现不俗。应该说,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能够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井冈山能够成为军事根据地,没有袁、王的出色表演是不可想象的。他俩及所部官兵都是在井冈山土生土长的,熟悉这里的几乎每一块山石、每一根树木,又拥有民众,善于和对手“捉迷藏”,在迂回中消灭对手(这恰与毛泽东主张之游击战战术原则偶合)。1929 年春,国民党军以 20 倍于工农红军的兵力向井冈山进行“会剿”。红四军主力主动跳出包围圈进军赣南,王佐率部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守山。后红五军被迫撤离,王佐仍“埋伏于井冈山附近”,并将部队编入红五军第五纵队,自任副司令员,坚持与敌军作战,使“边界区域仍然在赤色群众之掌握中”,最后与红军主力一起重树井冈红旗。

除我们上面提到过的袁、王所任职务外,袁文才还担任过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第一、二届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宁冈县委书记等职;王佐则任过新遂边防务委员会主任、湘赣边界特委二届委员等职。其中,袁文才于 1927 年底参加红四军前委,后又成为红四军军委委员,在湘赣边界党、政、军领导人中仅排名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之后。

袁文才和王佐的经历至少表明了以下几点:

第一,袁、王贫困的家境和痛苦的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萌生的报仇雪恨思想,使其投向革命具有某种必然性,事实上,革命队伍中的很多人走的是与他们相似的道路。

第二,设若没有袁、王,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失败后向乡村退却的这段历史恐怕就得改写。举两例证——反面的《陈家骏等报告宁冈红军情况》:“湘赣不靖也,推原始无袁文才不能勾引毛泽东,无毛泽东焉能结合朱德?”正面的《中央民族学院熊寿祺同志谈话》、《陈伯钧同志谈话记录》:“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只有两营多人,没有袁文才答应在茅坪安置伤病员,没有袁文才联合王佐而不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站

住脚”，“那时是革命低潮时期，不靠袁文才王佐，我们就没有办法支持武装斗争”。

第三，袁、王二人一度受到重用，从前述他们任职情况即可见一斑，袁、王二人的住处甚至还被列为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络的“永久通信处”。

这样两个投身革命、忠诚革命而且有功於革命的人，最终丧失了与革命者为伍的资格而被自己的同志所杀害（这些同志中有些甚至还可能是当年由袁、王从永新大牢中营救出来的）。这种结局未免使人寒心，特别是它发生在革命最困难因而也是最需要袁、王这样的军事指挥人才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

其实，袁、王的经历中已经包含了我们了解历史之谜的一个最基本的线索：原来，奥秘在于他们曾经是“土匪”！对他们来说，这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耻辱，这种耻辱紧紧地伴随着他们（就像几年后希特勒大规模排犹时给犹太人标上的“·”印记一样），直到他们死去。这种出身当然也使他们带有一些难以为革命所容忍的习气。他们从来是天地人“三不管”，过不惯受人约束的生活。红四军进军赣南时，作为军参谋长的袁文才，竟于中途开小差，跑回宁冈老家。至于不服从上级调动、不遵守红军纪律、遇事自作主张的事，在袁、王那里也时有发生。另外，1929年2月《杨克敏关于湘赣边界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信仰群众。袁、王二人相较，则王较爽直，但都是个性很强，不大接受批评的，边界因称为‘特别党员’……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1930年4月7日《红军第五军寄来的信》：“自过花天酒地的山大王生活……”。这些情况在袁、王那里都是存在的。

然而，就该杀？

线索只能帮助我们探索，它显然不是最终的答案。

可资探索的还有一条线索。关于袁、王，确有不少历史文件说他们如何坏，杀他们有报告，也有批准手续。但当我们翻阅这些发黄的历史见证时，发现它们极大部分是袁、王被杀以后形成的。如赣西南特委（原来的湘赣边界特委）、红五军前委、军委及当时派到边界的中央巡视员及红五军领导人的一些报告都是如此。是不是因为袁、王既死，死无对证，而且可以为他们擅杀袁、王的行为作辩护呢？4月9日批准杀掉袁、王的《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宁一号》一看即知是为追认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而补办的手续。至于要调袁、王部队到永新县城编队，编为红六军三纵队，袁文才为司令，王佐为副司令，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等，不是骗局又是什么呢？

这不得不使人怀疑谋杀者的用心，尽管这种怀疑尚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值得提及的是，袁、王被杀后，红五军四纵队进到宁冈茅坪和大小五井一带追剿“袁、王土匪残部”；袁的部下谢角铭把捉来的茶陵挨户团团总罗克绍放了，并与王佐之兄王云龙一道举起白旗，“电省反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随之丢失；红军两三次攻至黄洋界山脚下均告失利。从此，共产党武装再也未能回到井冈山，直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这一片

地区。

这样的代价，恐怕为谋杀袁、王的人所始料不及。

死之余波：元帅的命运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仍乐意做下面这个假设：如果当年毛泽东还在井冈山上，袁、王会不会遭此厄运？

袁、王与毛之间的关系一直不错。袁、王在毛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毛亦帮助袁、王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毛泽东对袁、王十分尊重，一有机会，便找他们谈心。有一次路过茨坪，与王佐谈到半夜，王佐感动之余，常对人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袁文才也曾叹道：“共产党真会带兵，这样搞怎么能不打胜仗！”正因为这样，袁、王亦非常信任毛，甚至产生了崇拜的心理，袁曾公开说：“我就听一个毛委员的。”宁冈分田，王佐在山上有千多担水田，他有点不乐意分出去，毛泽东劝他不要保持土地菩萨。王佐即将自己的田悉数分给了农民群众。

在职权范围内，毛泽东保护过袁、王二人。1921年1月，毛泽东在柏露会议上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时，曾对袁、王作过这样的分析：袁文才本来就是党员，不能杀；王佐虽然不是党员，但过去和豪绅对立，经过改造又入了党，性质已经起了变化，不能视作“土匪”，没有理由杀他。于是“经多方解释，还是取容纳训练态度”。

据此，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毛当时在山上，袁、王将逃过此劫。至少，孤立地看袁、王事件是如此。

但是，把袁、王被杀和以后肃“AB团”、“改组派”联系起来看，袁、王之死难以幸免，可说是“命中注定”的了。

不祥之兆早在1928年就已显露出来，其时距袁、王迎接毛部上井冈山还不到一年。当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一段“对土匪的关系”，内中指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或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如果说，这段话是给袁、王及其有类似出身的共产党基层领袖的头上张开了一张死亡之网，那么，前引之《杨克敏关于湘赣边界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则是将这张网进一步收紧了。它声称“……我们与他们（指袁、王）利害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批准杀掉袁、王的《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宁一号》中所列袁、王的两大罪状。尽管在此文中已是第三次出现，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清理它，而对于洗刷袁、王来说则是至关重要的。

罪状之一：“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1928年7月28日，谢觉哉在《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一文中报道：“宁冈土地已分配完毕，永新大部分土地已（分）配好！”陈正人回忆：“井冈山最早土地革命是在宁冈进行的，因为那里是一个巩固的根据地。”熊寿祺回忆：“宁冈的大事，井冈山的大事，没有得到袁文才的同意，没有得到王佐的同意，他们不点头，我们就不做。”另据当地的一些老人回忆，茅坪一带，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后就分了田，当时袁文才还深入到坝上乡，领导打土豪分田地。乡政府决定把步云山白云寺前面最大的一坵，可割十五六担谷的好田分给袁文才，袁谢绝了。至于王佐听了毛泽东一番劝告后分掉自己的田地，已于前述，不复赘言。上述史实表明，对于分田，袁、王在开始时可能有想不通的地方，有过不同意的表示。但实际上是按中共党组织和毛泽东的意见做了的。而且，像分田这样的大事，不征得袁、王同意是不能设想的，宁冈、永新一带分田如此迅速，如此顺利，如此彻底，恐怕不能说同袁、王的支持没有关系。袁、王二人都是湘赣边界革命政权的领导人，反而反对自己的政府，这种罪名，除了“莫须有”外，我们实在想不出别的形容词。

罪状之二：“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这里的核心是袁、王二人没有听信边界地方党委某些人的劝告杀掉罗克绍。以罗为头子的茶陵挨户团是永新赤色政权的老对手，罗有一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袁、王早就想把这个工厂搞过来。据刘良益回忆：“……捉到五县（茶陵、鄱县、宁冈、永新、莲花）联防总指挥罗克绍，没有及时枪毙他……袁文才当时的意思是：在捉到罗克绍的同时，又捉到28个枪工，袁想利用罗，沟通五县敌人反水到红军这边来，同时利用枪工，到长沙运来钢材造枪，一切办妥后再杀罗不迟。当时宁冈县委负责人谢希安等就向边界特委告袁文才是别有用心。”郑善致回忆：在出发去打罗克绍前，袁文才集合部队讲了话，他说：“罗克绍有三十多人的兵工厂，每天可以造一条七九漏壳枪，我们要把它全部缴过来，对工人不要开枪，要向他们做宣传，要动员他们过来给我们造枪。”刘克犹回忆：“其时，袁文才、王佐正好抓住茶陵挨户团总罗克绍，以为人质，要罗克绍交出他那个枪械所的人员和设备，便可以放回去，否则，就要杀他。”江照明回忆：“袁文才对罗克绍说：你不要怕，快写信回去把枪全交给我们，我们大家以后在一起。罗克绍当时说好，然后就把罗克绍放到小水头的土豪棚里（专门关抓来的土豪的地方）。”从这些回忆看，很难说袁、王在勾结罗来扰害赤色政权。在我们看来，袁、王如果有这样的意图，根本不必捉来罗，只消与其里应外合，颠覆永新革命政府可说是易如反掌的事。

问题显然不在这里。

紧张复杂的环境，扑朔迷离的情节，掩盖了事件背后的真正动因，以致于“剪不断，理还乱”。清理这团历史的乱麻，我们的视线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不错，中共六大的决议中包含了对袁、王非常不利的内容。但是，说到底是一个如何理解、如何执行的问题，毛泽东就曾以他特有的方式抵制了这些政策。

其实，还在中共六大之前，“土匪”说就已经在地方党委中有了一定的市场。中共湖南省委1928年6月给边界的一封指示信中说：“……四年的改造工作，应当立即开始，注意洗去流氓无产阶级、土匪与红会的分子，增加工农的志愿兵。”湘赣边界地方党委则认为毛泽东、朱德等开创并经营3年余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权“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